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瑞典】托米·本特森 【美】康文林 【美】李中清等 著

李霞 李恭忠 译 李恭忠 校 史建云 审校

压力下的生活：

1700～1900年欧洲与亚洲的死亡率和生活水平

Life under Pressure

Mortality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Europe and Asia,
1700-190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0 EAST LEXINGTON AVENUE
NEW YORK, N.Y. 10017-2453
U.S.A. AND CANADA
0022-2195 (1998) \$12.0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0 EAST LEXINGTON AVENUE
NEW YORK, N.Y. 10017-2453
U.S.A. AND CANAD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0 EAST LEXINGTON AVENUE
NEW YORK, N.Y. 10017-2453
U.S.A. AND CANADA

压力下的生活：

1700 ~ 1900年欧洲与亚洲的死亡率和生活水平

【瑞典】托米·本特森 【美】康文林 【美】李中清等 著
李霞 李恭忠 译 李恭忠 校 史建云 审校

Life under Pressure
Mortality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Europe and Asia,
1700-190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压力下的生活: 1700 ~ 1900 年欧洲与亚洲的死亡率和生活水平/〔瑞典〕
本特森等著; 李霞, 李恭忠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12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ISBN 978 - 7 - 80230 - 463 - 5

I. 压... II. ①本... ②李... ③李... III. ①死亡率 - 欧洲 - 1700 ~ 1900 -
文集②死亡率 - 亚洲 - 1700 ~ 1900 - 文集③生活水平 - 欧洲 - 1700 ~ 1900 -
文集④生活水平 - 亚洲 - 1700 ~ 1900 - 文集 IV. C924. 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0576 号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压力下的生活:

1700 ~ 1900 年欧洲与亚洲的死亡率和生活水平

著 者 / 〔瑞典〕托米·本特森 [美]康文林 [美]李中清等
译 者 / 李 霞 李恭忠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辑中心 (010) 65232637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赵慧芝

责任校对 / 单蔚蔚

责任印制 / 盖永东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 20.75 字数 / 531 千字

版 次 /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230 - 463 - 5/K · 063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07 - 6020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5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 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 桦

邹爱莲 孟 超 徐兆仁

戴 逸

编译丛刊编委会

主编 于 沛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美〕孔飞力 王大庆 王 江

王晓秋 〔法〕巴斯蒂夫人

〔德〕达素彬 〔俄〕米亚斯尼科夫

朱政惠 刘 东 张西平

〔英〕吴芳思 杨念群 赵世瑜

耿 昇 徐 浩 徐思彦 钱乘旦

虞和平 戴 寅

Tommy Bengtsson, Cameron Campbell, James Z. Lee, et al.
Life under Pressure
Mortality and Living Standards in Europe and Asia, 1700 ~ 1900
The MIT Press, 2004

本书根据 The MIT Press 2004 年版译出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 世纪、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

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18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



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绍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

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 年 5 月

原版序言

研究群体和个体层次的人类行为，是所有社会科学和部分人文学科的核心任务。人口统计学致力于对于人口进行数理研究，从而对完成上述任务提供了一整套分析工具。人口统计学家主要关注计量方法在人口分析领域的发展和运用，他们的工作对诸多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作为一个学科，人口统计学主要关注如下问题：理解和描述大范围内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动过程（这些过程共同构成了人口变迁）及其含义，以及这些过程与各种资源（不论是经济的还是环境方面的）与其他社会进程的相互关系。人口史研究一直是这些研究的核心。

然而，人口史研究直到最近才开始改变我们关于人口行为的基本理解。两百多年来，马尔萨斯模型一直主

导着我们关于人口过程的理解。马尔萨斯区分了两种理想形态的人口过程：一种主要取决于死亡率，他称之为“积极抑制”（positive check）；另一种主要取决于结婚率和出生率，他称之为“预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人口的“积极抑制”伴随着持续贫困，而“预防性抑制”则带来繁荣。在一篇权威的评论文章中，他综合了当时所能获得的知识来证明如下观点：第一种过程是人类大部分历史上（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普遍现象，而第二种过程则是“近代”欧洲（尤其是当时英格兰）的特殊现象。

对马尔萨斯而言，我们今天所说的“计划生育”意味着一种独特的西方式本领，即有意识地计算生育小孩的成本和收益，仔细考虑是推迟还是放弃结婚。换言之，西方的经济繁荣，是西方个人主义和理性的结果。现已证实，“预防性抑制”确实在英格兰出现过，而且甚至比马尔萨斯设想的还要早，这一事实激发了马尔萨斯理论的复兴（Wrigley & Schofield, 1981）。约翰·哈吉那尔（John Hajnal, 1965, 1982）、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 1978, 1986, 1987）等学者提出，欧洲人口转变的起源、欧洲个人主义的根源，甚至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都紧密交织在一起，并根植于促进了这类革命性的社会经济变迁的欧洲家庭和人口文化之中。他们和其他当代社会理论家们比马尔萨斯本人更明确、更系统地确认了一些人口制度，建立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提升并光大了马尔萨斯学说的理论含义（Goody, 1996；Schofield, 1989）。



关于非西方世界人口行为的新近发现表明，其他地方、其他形式的“预防性抑制”同样重要。李中清、康文林和王丰的研究显示，有相当比例的非西方人口经历的“积极抑制”比马尔萨斯及其追随者所设想的更小，而经历的“预防性抑制”（Lee & Campbell, 1997; Lee & Wang, 1999）则更多。这些发现提供了一些关于中国历史人口的集体人口指数，这些指数有力地挑战了许多关于比较社会经济和人口进程的马尔萨斯假设，反过来又受到了太平洋两岸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的挑战（Brenner & Isett, 2002; Campbell, Wang & Lee, 2002; 曹树基、陈意新, 2002; Huang, 2002、2003; Lavelly & Wong, 1998; Lee, Campbell & Wang, 2002; Pomeranz, 2002、2003; 王丰、李中清, 2002; Wolf, 2001; Zhao, 1997a、1997b、2002）。

同时，新的数据和方法开始揭示出经济和其他外在压力之下人口反应的复杂性。马尔萨斯及其继承者集中关注集体层面的经济条件和人口行为之间的关系；而在今天，微观层面的纵向记名数据的时间序列和事件史分析相结合，却使我们可以细致区分死亡率、出生率以及由社会阶级、家庭背景和个体层面的其他因素引起的各种人口反应之差异（Bengtsson, 1989、1993b）。至少在比利时、中国、意大利、日本和瑞典这五个国家的某些社区，存在着相当具体的历史人口登记数据，不同学者已经对它们进行了分析（Bengtsson & Saito, 2000a; Derosas & Oris, 2002）。

“欧亚人口和家庭史项目”是一项集体的努力，在这

个项目中，来自不同国家和学科的学者们运用这些新数据和方法重新考察马尔萨斯模型，对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人口进行比较。通过对欧洲和亚洲的类似数据用基本相同的方法进行分析，我们比较了所研究的特定社区里由各种经济条件引起的人口反应模式，以发现其中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我们把个体层面的事件史分析结果与关于经济压力下人口行为的正统的马尔萨斯模型结合起来，从而对人类行为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这套关于欧亚人口和家庭历史的丛书中，我们考察和比较了个体层面的死亡率、出生率、结婚率和迁移模式。

本丛书各卷表明，人口行为结果的模式取决于社会而不是生物学因素。在集体层面，人口结果可能受制于经济条件、气候或者地理因素；但在社区层面，它取决于特定的制度性政策；而在家庭层面则取决于有关资源 and 责任分配的具体决策。与此相应，以往的人口行为由于地理位置、社会经济条件、家庭构成以及家庭内部地位而千差万别（Lee & Campbell, 1997），短期压力下的人口反应也同样如此（Bengtsson, 1993）。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个体人口行动都是政治和社会谈判的产物。在此意义上，“欧亚人口和家庭史项目”进一步确认了社会行动和人类行为的重要性。

我们的努力显示，古典行为理论的宏大叙事，过分强调了人类对外在压力反应的一致性。实际上，人类行为因年龄、性别、地理位置、家庭组织、地方制度、特定职业、区域历史、财产和其他许多因素而异，对不同的经济束缚和机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因此，死亡率对经



济变迁的反应几乎总是因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条件而异，但不同年龄、性别和社会阶级的反应模式却有着巨大的不同。

换言之，我们的工作两类鲜明对立的社会理论之间架起了桥梁：一类强调普遍性和相似性，比如认知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生物学；另一类强调偶然性和差异性，比如人类学、文化研究和历史学。一方面，我们提出了不同的人口行为模式，它们反映了年龄歧视、性别歧视以及其他形式的偏爱和特殊性，表明在特定束缚面前社会行动和人类行为确实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证明这些模式是因不同人口而异的制度安排、社会关系和特定偏好的产物。因此，虽然在任何地方外部力量都会引起人类的反应，但反应的模式却各不相同，这取决于民族、地域和社区背景，以及亲属、家庭和个人环境。

致 谢

大型项目和长期构思的背后往往有着深情厚谊的支撑。“欧亚人口和家庭史项目”和《压力下的生活》一书自然如此。

速水融最早提出了这项大范围比较项目的设想，即对欧洲和亚洲的记名户籍资料进行合作研究。1993年，他开始与托米·本特森商量如何组织这个项目，并于1994年6月在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召开了关于这个欧亚项目的首次组织会议。我们非常感谢他的领导工作、组织支持和对本项目许多参与者的资助。

随后是许多次会议：1994年11月在隆德（Lund）召开第二次组织会议，最终确定了本项目的参与成员；1995年1月在威尼斯召开了首次研讨会，确立了标准的死亡率比较模型；1997年在布鲁明顿（Bloomington）

召开了另一次研讨会，对这些模型作了调整；1997、2000年先后在京都召开了两次会议，公开发表了我们关于死亡率研究的初期和最终成果。

《压力下的生活》一书的先期测算结果和草稿，曾经提交给四年一度的国际经济史大会1998年会议、2000年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2001年召开的国际人口科学研究大会以及社会科学历史学会1995、1996、1998、2000年会，还有美国人口学会1998、1999、2000年会。如果没有这么多的机会来发表并与别人相互讨论和反思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的分析和这部著作将远远谈不上完善。

我们非常感谢下列参与讨论者对本项目及其阶段性成果提出的宝贵意见：Jan deVries, Robert Fogel, Myron Gutmann, Michael Haines, Shigemi Kono, Ronald Lee, Kiyomi Morioka, Mari C. Nelson, David Reher, James Riley, 斋藤修, Roger Schofield, G. William Skinner, Charles Tilly, Donald Treiman, Frans van Poppel, David Weir. 特别要感谢 Ronald Lee 和为 MIT 通读本书初稿的六位匿名评阅人，他们提出了很长的具体意见，使我们获益匪浅。同样，Jack Goldstone, Daniel Little 和 Ken Sylvester 对丛书序言的评论也对我们很有帮助。许多人对书中不同章节提出了评论意见，我们将在每一章里分别对他们表示谢意。

我们对这些会议的主办者深致谢忱，同样的感谢也要献给如下机构：日本文部省为上述许多会议和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资助；全国儿童健康与人口发展研究会(R13 HD34883-01)、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东亚区域研究